



重庆第一家照相馆创办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,最初拍照片可是相当奢侈——

拍张全身照要一到两块大洋 一张着色相片能抵300斤大米

□杨耀健



从清末到现在的100多年间,重庆照相馆拍摄的照片,记录了不同时代人们审美的情趣与演变,产生了不同的风格样貌,也让我们看到先辈们所特有的表情和梦想。



重庆均和昌照相馆老照片

▲老相馆的人工布景

相馆初创 吸人眼球

据史料记载,重庆第一家照相馆创办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,名为“均和昌”,地址在城内江家巷。老板名叫梁晓初,广东人。广州是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,洋货不断涌入,他做洋货代销赚到一笔钱,从洋行职员手中买到进口照相机,从爱好到钻研。他在与人交谈时,无意中听说重庆是西南最大的水码头,于是不远万里来此开业。

梁晓初使用的是一台法国产达盖尔座机,银版。这种座机十分笨重,外形是一个大木箱,黑色贴皮,上面是机身,下面是三脚架,机位必须固定。没有快门,用镜头盖做快门,凭经验控制曝光时间。梁晓初有知识有技术,他拍照时沉着冷静,总是恰到好处取下镜头盖,又恰到好处蒙上镜头盖。冲洗和修整照片等后期制作,起初都是他独自承担,后来才招收徒弟做帮手。

梁晓初拍摄的照片主要是人物,一般是全身像。银版底片成本高,顾客多是达官贵人。他首创了铭文,在每张照片上都印上“均和昌”字样,成为最好的广告。

当重庆人初次见到自己的形象出现在纸质照片上,都异常兴奋,放大后挂在堂屋墙上,向亲友炫耀。一时间,满城争说“照相”这个新名词,即便没有钱,也要去看稀奇。梁晓初装底片和取景时,要钻进黑布罩子里,于是人们都说他一定是魔法师。

短短几年,梁晓初赚了大钱,又增添了德国制造的“高治”镜头,全铜制作,拍照十分清晰。大座机移动困难,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出大价钱,他也愿意走一遭。笔者最近获得一张梁晓初去外地拍摄的老照片,画面背景是当地的明清建筑,花了不知多少银两的一位顾客和他的朋友置身于石梁上。照片的左下角有铭文:“四川重庆江家巷均和昌照”,画质很好。遗憾的是,梁晓初染有鸦片瘾,逐渐入不敷出,1926年停业。

20世纪初“宝记”照相馆开办,地址在米花街,首开自然光线拍照,在露天玻璃棚内摄影,不用灯光和其他人造光,全靠透过顶棚的日光。馆内布置了假山鱼池,室内绘有山水和楼阁背景,这说明照相师开始了本土化的艺术创作与实践。布景所用的器物,虽然只有桌椅、几案、花瓶花卉等,但是却蕴含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。其参照物,则是明清人物肖像画、话本插图,力求效果相近。

1910年创办的本埠第三家照相馆,取名“天然楼”,地址在黄桷街,门面为三开间楼房,第一层布置成室内小花园。它使用的设备仍然为大座机,团体拍照需要事先预约。

这两家照相馆采用了“安布罗法”,取代“银版摄影术”,降低了成本,这一进程和西方同步。他们的相片上也印有专门设计的馆铭,具有了自主品牌意识。

时代进步 行业兴旺

随着长江、嘉陵江航运的发展,重庆的商业贸易日益活跃,成为举足轻重的物资集散地,带动了城市消费的快速增长。到20世纪30年代,本埠照相业蓬勃发展,先后开办了“丽芳”“容真”“留真”“大中华”“得圆”“俨然”“三民”“雪怀”“晴霞”“明星”“冠华”“光华”等照相馆,为西部诸省之冠。

抗战时期,沦陷区的许多照相馆纷纷迁来重庆,使本埠的照相业进入鼎盛期。从外地迁来的众多相馆中,尤以“千秋”“启新”“皇宫”“庐山”等几家技术好,设备精良,故而顾客盈门,生意兴旺。

那时的重庆照相馆,先后采用美国制造的维因倍增相机。这种室内座机虽然还是笨重,但它机身前部可以根据需要,换装一只或四只镜头。机身后部的感光组件,则可以上下、左右移动。通过更换镜头或移动机身后的感光组件,可以让锡版的不同区域分别感光。它用一



照相馆打折,市民争拍照片。



重庆照相馆的老式座机

张大底片,便可以分格拍摄出一张乃至数十张照片。同时,新式座机已有快门设计,由照相师手执皮囊控制,轻轻捏一下即可曝光。

一些较大的照相馆,抗战时期开始购买手相机,多为德国生产的品牌机“蔡司”“徕卡”“爱克发”,以及美国的“柯达”。后者可以拍摄彩色照片。这样,如果顾客想去风景区拍照,相馆可派人携带手相机前去服务。

此时照相馆在结婚照中引入西式装扮,顾客不再穿长袍马褂,不再珠光宝气。新郎身着笔挺的深色西服,打领带;新娘身着拖曳及地的白色纱袍,头巾、手套也是白色的,手捧鲜花。讲究的大户人家,新媳妇两侧站有伴郎和伴娘,外加一男一女两个小傣相,拍出来既有派头,又有早生贵子的寓意。

还有几家从上海、南京迁来的照相馆别出心裁,对特别漂亮的女士免费,除了送一套照片,还把样照挂在橱窗里展览。电影厂、话剧团,常到相馆橱窗照片中寻找合适的演员,这当然会吸引明星和想成为明星的人们。这种做法非常轰动,使照相成为一种社会时尚。

上海籍店员顾阿福回忆道:“那时候重庆的照相馆门庭若市,节假日从早到晚加班,能拍一二百人。店里只有三四个职员,拍摄、暗房冲印、整修、剪裁,大家连轴转,最

忙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。”他说,照相馆的薪酬也高,远超公教人员,不愁吃穿,家属还买金戒指、金耳环。

社会各界人士,尤其是女影星、女艺人、名门闺秀、女学生最喜欢照相,军政要员和文化人也参与其中,极大丰富了照相馆的客户群体。

战时的照相馆店面不大,多为一楼一底,楼下设橱窗,开票和接待顾客。楼上化妆、拍照。

抗战胜利后,江浙一带的照相馆从业者大多返回原籍。但也有一些年轻从业者,见重庆顾客多,市场成熟,选择留下来,购买其他返乡者的门店或设备另起炉灶,扎根重庆。原重庆市美术公司老技师汤文虎,就是留下来的上海人。

本埠名店 脍炙人口

重庆最有名的照相馆是“留真”,由广东人黄少怀创建。他自幼酷爱摄影,留学日本深造,以此为职业。1919年回国,他原想在上海开店,考察后觉得那里竞争太激烈,遂沿江而上调研,最终选定水运发达的重庆。日本称照相为写真,受此影响,黄少怀将店名取为“留真”。铺面设在左营街(今新华路中段),临街两楼一底,位置居中,便于招徕顾客。

开业之初,黄少怀亲自拍照,他知道顾客往往是为了家庭大事来留影,所以特别细心,从不敷衍了事。晚上他亲自修底片,把拍摄中光照不匀的地方,用铅笔进行修补。这个全靠手、眼功夫,还需要熟练。然后就是冲洗照片,根据底片曝光的程度,选择用几号相纸,冲洗后烘干。最后还用毛笔修饰照片上的人物,印上铭文,裁定纸装饰。

由于“留真”口碑好,抗战时期不少名人光顾,也是市民照相的首选。

另一家有名气的是“千秋”照相馆,后台老板侯志明,黄埔军校四期学员,中将军衔。“千秋”实力不及“留真”,但是分店多,在大同路、青年路、两路口、小龙坎、北碚都有分店。主要业务是拍登记照,快捷便宜,而且常打七折、八折,不乏顾客。1949年,“千秋”仅在两路口一带就开了3家分店,后来合并为一个店。

旧中国技术落后,所有照相器材都是进口货,因而价格昂贵,照相属于奢侈消费。据史料记载,初期拍全身照需一到两块大洋,拍摄并放大一张24英寸着色相片,收费12大洋,约等于300斤大米,非一般人可问津。

“安布罗法”取代“银版摄影术”后成本下降,照相从此逐步走近寻常百姓。但凡婚丧嫁娶、老人祝寿、家庭聚会、学生毕业等,开始时兴到相馆拍照。有时照相馆打折,市民蜂拥而至。

那时照相馆的规矩与现在大不一样,一是收款叫作订单,先交半费,取照片时全部付清。订单上注明顾客的姓名和地址,可加钱要求照相馆派人专送。倘若顾客对照片不满意,或是退还订金,或是补拍。另一个规矩是,取件时只给照片不给底片,理由是版权所有。但照相馆保存顾客的底片如同保存档案一样稳妥,顾客可凭订单随时加印照片。

旧中国照相收费昂贵,许多人一生只照过几次相,有的贫民一辈子不知道何谓照相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这种状况才得到根本的改变。如今,几乎人人拥有的手机随时可以拍照,照相馆很少,业务也只是拍登记照和代客洗印。

然而,老相馆留下的老照片,凝固了光影,见证着时代,使我们加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极大地增强了历史感知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)
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